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14 讲，结构

和修辞批评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好吧，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与释经学和圣经解释相关的主要话题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我们研究了诠释学、诠释学理论和解释方法如何从更多以历史为导向的方法转向，这些方法侧重于文本背后的历史、作者的意图、产生文本或作者在文本中使用的来源和形式，并重点关注在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中，作者的意图是意义的主要决定因素。考虑到这种方法提出的一些问题，从历史上和逻辑上讲，焦点转向了文学方法或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

因此，我们研究了一些文学批评、形式主义，还专门研究了叙事批评，以及它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以及它如何在解释圣经文本时有用。我想继续简单地研究另外两种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释方法，其中一种方法不是，至少其中一种方法不向作者提出问题或关注作者，而是仅在文本中寻找意义。另一种确实经常考虑作者、历史读者和背景，但仍然关注文本，而不是文本背后的来源和形式，而是关注文本及其运作、说服技巧和类似的东西，这被称为修辞批评。

因此，我们将讨论这两种最终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我在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中包含了修辞批评，并询问它们是什么、它们做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对圣经解释和解释文本有帮助或无帮助旧约和新约。我想讨论的第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

方法被称为结构主义，我不想花很多时间讨论它，原因我们会看到，但结构主义似乎通常已经走到了尽头，实际上它是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运动所取代，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讨论它，并且它已被其他方法所取代。结构主义在某些方面很难定义，尤其是当你开始阅读它时。

它似乎更像是一种哲学或一种文本方法，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或原则集合。结构主义再次成为一种远远超出圣经文本甚至书面文本范围的运动或方法。它被用于人文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等。

但它确实在圣经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实际上发展得相当早，始于 20 年代的一些运动，但最终也进入了圣经研究。根据结构主义，它是什么，根据结构主义，传播是传播中最深刻和最重要的部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传播是文本，更具体地说是旧约和新约的文本，是传播中最重要和最深刻的部分不在文本的表面层面。因此，当一个人阅读一篇文本时，它最重要的部分以及意义和理解的最重要部分不在于文本的表面结构，不在于页面的表面，而在于深层的意义。文本的结构。

因此，表面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术语对于结构主义通常很重要。简单来说，这意味着表面结构就是我在文本表面发现的内容、单词、语法结构，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本大纲，文本的结构和组合方式。但深层结构实际上是产生表面现象的深层结构。

事实上，结构主义所做的就是试图渗透到表面结构的背后，即人们在文本中发现的内容，以恢复深层结构，以及产生这种结构的更深层次的含义。连作者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深层结构。因此，结构主义再次偏离了作者的意图。

解释的主要目标不是揭示作者的意图，因为创造表面结构的深层结构、决定作者所写内容的深层结构可能不可用，或者作者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深层意义结构是人类思维本身所固有的。而在人心中。

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经常与措辞、语法、文本如何组合和安排其轮廓相关的表面结构。同样，我们的目标是绘制文本表面结构背后的深层结构。而结构主义所做的事情，往往会与反对派一起发挥作用。

例如，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等等。结构主义的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将简要地看一下至少在北美，特别是在圣经研究中拥护的一个人，他拥护结构主义和然后简要地看看它去了哪里并通过评估的方式。

一个例子是结构主义，至少一些研究结构主义并将其应用于圣经文本的人经常使用一种称为行动模型的模型。也就是说，它特别从主要活动的角度来看待叙事，主要结构似乎是叙事的普遍结构，它产生了所有不同的叙事和不同的表面结构。例如，这个行动模型由叙事中的六个不同的演员组成。

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在谈论，虽然我不认为事情总是这样，但至少对于那些提倡这种模式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太多地谈论人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叙述顺序，但底层的结构。这个行动模型由叙事中的六个部分或六个行动者组成。第一，有一个发件人。

第一个元素是叙述中存在一个发送者，其功能是将对象传达给接收者。因此，发送者正在尝试将对象传递给接收者。然后他这样做，发送者通过主题将该对象传达给接收者。

这个主题受到某些帮助者的帮助，这将是第五类，并且受到某些对手的反，这是你的第六类也是最后一类。因此，这里有六个行动者，即所谓的行动模型，其中发送者试图将对象传递给接收者。他通过一个受到帮助者帮助、受到对手反对的主体来做到这一点。

然后的目标是观察叙事及其如何遵循结构，并了解故事和叙事背后的基本结构。例如，这也适用于旧约文本和新约文本，它也适用于寓言，我们稍后会看到一个例子，以及较小的叙事单元，如寓言、较小的故事，但也适用于整个故事。叙述。一个有趣的例子，至少在我感兴趣的领域，《启示录》一书是《启示录》经常受到这种行动模型的影响，试图着眼于主要行动者，即叙事背后的主要结构。

比如启示录的发送者，根据一种分析，启示录的发送者就是神自己。他试图传达的目的是拯救或审判。该对象的接收者，接收者或接收者，将是教会，所涉及的七个教会，或整个世界。

发件人试图通过主题来传达这个对象，即拯救或审判，主题是耶稣基督，他得到天使的帮助，文本中天使的存在，并受到许多反对者的反对，特别是撒旦有时，这六个行动者的模型被应用于各个章节，有时，整本启示录都根据该模型进行分析。再说一遍，我的意图不一定要评估这一点，尽管它可能有助于揭示主要人物是谁以及他们在叙事中扮演什么角色。

但只是给你一个例子，说明有时如何根据结构主义来分析圣经文本，或者查看文本的深层结构。现在，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该方法的困难之一是，有时，那些声称正在分析深层结构的人似乎实际上正在分析表面上的内容。但我们会回到这一点。

我想简单地谈谈圣经研究中结构主义背后的主要人物之一，一个名叫丹尼尔·波特（Daniel Potte）的人，帕特（PATTE）。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让结构主义流行起来的人，或者是让结构主义在北美圣经研究学者以及其他地方流行起来的人。丹尼尔·波特（Daniel Potte）受到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以书籍和文章的形式出版了许多出版物，在这些出版物中，他展示了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任教的结构性圣经解释方法的价值。美国多年来，再次在学者中流行结构主义作为理解圣经文本的方法。

波特再次提出，他建议对文本采取共时性的方法，即按原样看待文本，这将揭示文本的各种结构、语言结构、叙事结构、神话结构是主要文本本身的基础，是文本结构的基础。波特表示，文本下的这些底层结构，这些语言、神话和叙事结构都很复杂，作者不一定知道。但这些基本结构决定了文本的含义，而不是作者的意图。

再说一遍，当我阅读圣经文本时，目标是能够绘制和揭示导致我在表面上看到的東西的潜在结构，这些结构可能在作者的脑海中，也可能根本没有。因此，根据波特的说法，在解释圣经文本时，作者的意图并不重要，因为你正在处理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结构。例如，波特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对圣经文本的评论中经常分析叙事结构。

他根据行动者或我们刚才讨论的行动模型来分析叙事，其中有一个发送者通过主题向接收者发送、传达对象。主体受到帮助者的帮助，受到反对者的反对。例如，他根据这个模型分析了好撒玛利亚人。

再说一次，我提供这一点的目的不是为了表明同意它，而是为了展示如何根据结构来分析一个寓言。因此，在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中，一个旅行者在前往耶利哥的路上被小偷或强盗跳跃和袭击的故事被击败了。祭司和利未人走过来，却什么也没做。

然后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来帮助他，试图让他恢复健康。波特在那个寓言中说，行动接受者是旅行者，即在路上的人。接收者传达的对象是他的健康状况。

主题是撒玛利亚人。帮手是为旅行者提供的食物。然后对手就是强盗，就是那些殴打他的人。

因此，人们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分析有何含义？但此时，我只想演示他如何使用该模型来理解一个寓言。或者当谈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时，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互动，波特根据文本中的对立进行了分析。这是结构分析和丹尼尔·波特分析的另一个重要部分，目的是根据文本中的对立来揭示深层结构。

例如，他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发现，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立，耶稣的身份与不知道耶稣是谁之间的对立，灵水与字面水之间的对立。再说一次，重点是这篇文本叙述的意义是在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中发现的，而不是在作者的意图中。现在，在对这种方法做出最后的陈述时，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我看来，你不再发现太多，至少你不会发现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圣经文本进行太多的研究，也许偶尔会发现。但同样，它基本上让位于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讨论的方法，那就是后结构主义。因此，关于此方法的一些观察。

首先，我们当时已经超越了结构主义。再说一遍，你对此知之甚少。甚至丹尼尔·波特（Daniel Potte）也从结构主义转向更多的社会学方法或文化方法来解释文本。

其次，一些人强调结构主义的困难之一是词汇的复杂性和用于描述词汇的技术性。人们通常必须掌握一种词汇，即高度技术性的词汇才能理解和使用该方法。第三，我已经暗示过的一项观察是，结构主义据称提供的见解通常更多地基于文本的表面结构，而不是基于深层结构。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有时，结构主义的一些见解似乎与人们通过简单分析表面结构本身获得的见解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有时它与文学批评并没有太大区别。

第四，我们是否应该忽略文本的表面结构而忽视文本的深层结构？那么，表面结构的目的是什么？既然我们只有这些，就应该忽略它吗？这是我们拥有的任何类型深层结构的唯一证据。当然，表面结构本身不应该被忽视。第五个问题是，当我们拥有的只是文本本身时，我们如何验证结构注释？因此，由于某些原因和其他原因，结构主义不再是解释学中真正的主要参与者。

再说一次，你并没有听到太多关于它的信息。尽管它仍然有一些影响，但你看不到很多文字。这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所以我已经触及它了。但我就这样吧，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方法，并让位于其他诠释学理论和解释圣经文本的方法。话虽如此，我想继续讨论我将考虑的最后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那就是修辞批评。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因为它不一定将作者或通常所说的修辞情境包括在内。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时可能会说的圣经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因此，这些内容常常仍然引起修辞批评家的兴趣。

但同样，由于它关注的是整个文本，因为它关注的是文本的结构和工作，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考虑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内容，从现在开始，当我谈论结构时，我将指的是文本的表面结构。我不会以结构主义使用它的底层深层结构的技术方式来使用它。

但是当我讲结构的时候，我会讲如何，用它来讲文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文本的表面结构。因为修辞批评关注的是文本整体、文本结构，所以我把它归入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范畴。不过，人们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

在我看来，修辞批评的主要特征是根据文本来分析文本，作为说服的手段。它从说服技巧和说服听众的能力的角度来分析文本。至少古代修辞学的经典表达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和罗马修辞学家以及他们如何构想修辞学。

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作，至少让我们了解了他们的修辞理论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许多人挖掘这些作品的价值，试图掌握圣经文本修辞维度的说服力方面。因此，根据修辞批评，对圣经文本进行修辞分析，或者如何组织和组合它们以进行说服，以及它们如何包含有说服力的论证。

修辞批评在旧约和新约解释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会看到，特别是在《新约》中，有几个人物与几乎完全采用修辞方法来分析《新约》文献特别相关。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特别是在新约研究中，修辞批评有两种方法。

首先，人们可以简单地研究文档的修辞技巧，重点关注风格、修辞格或修辞论证等内容，并查看修辞单位或修辞风格或论证在文本中的运作方式。适用于旧约和新约的一种常见方法或模型将包括这些步骤。第一，识别修辞单元，即通过隔离单元的开头和结尾来简单地识别文本单元。

其次，是提出修辞功能的问题，这个单元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如何发挥作用？但第三，还要分析修辞设置，即该单元正在处理的情况以及它如何运作，它试图做什么。最后，分析该单元的教学风格以及证明和论证等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修辞批评已被相当广泛地用来审视某些部分的修辞技巧、修辞功能、论证手段等。

同样，你可以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然而，第二种，特别是在新约研究中，第二种修辞批评方法确实流行起来，那就是分析新约文本，无论

是大段文本，特别是演讲，还是更具体地说，分析书信体文学，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的书信和书信，根据古代修辞演讲和古代修辞演讲模式进行分析。通常是在一些古代修辞手册中讨论和概述的古代模式，例如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撰写的，然后采用这些类别并采用这些修辞言语形式和模式，并根据以下内容分析新约文献那。

至少在福音派学者中，尤其是在基督教福音派学术之外，有两个杰出人物做得最多，首先是一个名叫乔治·肯尼迪的人，他在古典希腊罗马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是第一个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学做出贡献的人。是最早倡导和普及希腊罗马修辞学在新约文本中的应用，并根据希腊罗马修辞学分析登山宝训等文本的人之一。可能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新约学者中普及，普及新约文献的修辞方法，你会再次，你不仅会分析文本的修辞格和有说服力的手段，还有一些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本·威瑟林顿（Ben Witherington）经常与修辞批评联系在一起，但他从希腊罗马修辞文本手册中提取了整个修辞演讲，并将其大量应用到圣经文本中。本·威瑟林顿（Ben Witherington）几乎为所有新约文献撰写了注释，其中大多数，其中大多数，都被贴上诸如社会修辞注释，罗马书社会修辞注释，加拉太书社会修辞注释，社会修辞注释之类的标签。关于腓立比书等等因此，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在一系列社会修辞评论方面发挥了影响力，这些评论根据古代修辞惯例分析了圣经文本。根据那些分析演讲的人的说法，或者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中的演讲，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的演讲甚至耶稣的演讲，例如

福音书中的登山宝训，你会发现它们经常根据修辞学进行分析技巧，但我们说过，书信，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似乎为应用修辞批评提供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材料。在此过程中，根据一世纪及更早的希腊罗马语音模式惯例，完整的修辞演讲可能包含以下大部分或全部内容。

第一，修辞性演讲将包括所谓的劝诫。劝诫只是陈述原因，它是一种介绍，它陈述原因，它陈述问题，它试图获得听众的同理心，并试图让听众同情为他的观点辩护的人。第二种是所谓的叙述，基本上是对事实的叙述或说明，或案件的背景和事实。

第三是所谓的命题，它基本上是达成一致的内容，或者是要争论的要点，或者是作者将争论的主要论点。其次是第四个，**Probatio**。证据是作者所诉诸的证据和论点，证据通常有两种类型。

在**Probatio**中，**Probatio**通常是一个较长的部分，其中再次包含命题证明的所有论点，或者该人试图论证的内容。通常有两种类型的证明。人们常常可以诉诸一种悲伤或情感，或者一个人可以诉诸徽标，这是一种逻辑论证。

所以你会在证明中看到这两种类型的论证或证明。第五是所谓反驳，这是反驳对方论点的部分。最后，所谓的**paroratio**，**peroratio**，**a paroratio**，它简单地总结了论点，有点像演讲者的最后呼吁。

因此，这六个部分，序言、叙述、命题、陈述、反驳、论证，你会在大多数新约修辞批评介绍中找到这些部分，或者在新约修辞批评学术中的大多数方法中找到这些部分。再说一次，其中大部分或全部都可以在文档中找到。新约圣经文献也经常根据这些类型的类别进行分析。

修辞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似乎是从古代修辞手册中揭示出来的，那就是历史演说、修辞演说分为三种类型。同样，你几乎可以在新约圣经中任何修辞批评的处理中找到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首先，修辞性演讲可以归类为司法性演讲。

也就是说，司法修辞演讲会论证过去行为的正确性或错误性。而顾名思义，这种修辞演讲的场所自然是法庭。因此，司法类型的修辞演讲会论证过去的行为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

第二种类型的修辞演讲是所谓的协商修辞。深思熟虑的修辞所做的是争论，或试图说服，或劝阻听众未来的行动方针。因此，司法言论集中于过去的行为，无论该行为是对还是错。

深思熟虑的修辞演讲要么说服要么劝阻听众参与或参与未来的行动方针。因此，大概是一种可取的行动方针，演讲者试图说服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或者是一种不可取的行动方针，那么作者就会劝阻他们不要采取这种行动。最后，第三种修辞演讲被称为“Epicictic”，“EPIDEICTIC”。

再说一次，你可以在大多数涉及新约修辞批评的著作的标题中找到这些名字。史诗式修辞基本上是使用赞扬或谴责来肯定一种观点，或肯定当前的一套价值观。因此，无论是表扬还是责备，使用表扬或责备的技巧，无论是针对一个人，还是针对当前的一种信念或价值观。

因此，这三种类型的修辞，又是司法修辞，过去的行为，对过去行为正确或错误的判断，深思熟虑的修辞，重点是说服或劝阻听众未来行动方针的正确性或不正确性，以及然后是史诗般的言辞，肯定了当下的某些事情。现在，起点，或者说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我想是这样说的，修辞批评进入新约研究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一个名叫汉斯·迪特·贝茨的人，他写了一篇文章，或者也写了一篇文章，但写了一篇评论，这是一个称为赫美尼评论系列的重要评论，在其中他认为加拉太书是一篇护教或司法的修辞作品。因此，他是新约研究中最早根据修辞演讲技巧来分析新约书信的人之一。

他所做的是，他采取了成熟的修辞演讲的六个特征，劝诫，叙述，命题，感化等等，并且从这三种类型的修辞开始，他得出结论，加拉太书主要是作为一个道歉或司法的言论。也就是说，让读者相信过去行为的正确性或错误性。例如，你可以再次拿起他的评论，看到对他所做的事情的更详细的处理，但例如，他将加拉太书第 1 章、第 6 章到第 11 章视为劝诫，这部分建立了原因。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读者的同情心。然后是第 1 章、第 12 章到第 2 章第 14 节，他将其标记为旁白。这就是加拉太书的那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中间，你会发现保罗讨论他在犹太教之前的生活以及他与耶路撒冷使徒的互动，特别是在安提阿与彼得的互动。

所以贝茨将其标记为旁白，给出了案件的背景和事实。第 2 章第 15 节到第 21 节就是命题。这是主要论文。

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也是本书其余部分所争论的主要论点。第四，即当时的缓刑，贝茨将其视为第 3 章第 1 节到第 4 节末尾。因此，第 3 章和第 4 章基本上是贝茨看到保罗用来建立他的案子的一长串证明或论据。最后，他给第五章到第六章贴上“Paranasis”的标签，即“努力的材料”，这确实不符合那种修辞性的演讲模式。

但他认为最后两章是偏执或努力指挥类型的材料。现在，许多人实际上对贝茨做出了反应，并认为加拉太书并不是真正的护教书。我的意思是，你看看最后两章，保罗肯定是在说服他的读者服从，服从。

当你读加拉太书时，他试图劝阻他们不要采取犹太教徒正在犯下的行为，并说服他们在精神上生活。因此，最近，那些从修辞学角度分析加拉太书的人，将其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修辞学。甚至有些人将其结合起来，表明它兼具歉意和深思熟虑的修辞特征。

例如，本·威瑟林顿（Ben Witherington）在他对加拉太书的评论中认为，加拉太书是一段深思熟虑的修辞。他还根据劝诫和近比的相同类别对其进行了分析。虽然当你比较贝茨和威瑟林顿，甚至其他分析过加拉太书的人时，这很有趣，但有时他们在划分文本的位置，或者哪些部分属于命题，或者哪些部分属于这个或那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但关键是，加拉太书为新约书信的修辞方法的应用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田野。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其他新约书信也受到了修辞批评。例如，本·威瑟林顿（Ben Witherington）对其中许多内容发表了评论，但其他人也做出了评论。

《罗马书》、《以弗所书》已根据希腊罗马修辞学进行了分析，《腓立比书》已由许多学者进行了分析，《犹大书》和其他书也已接受了修辞分析，并可能取得了各种不同的成功。那么，对于修辞批评，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首先，当谈到修辞批评时，我认为修辞批评的价值在于它做了两件事。第一，它可以阐明例如演讲、信件或预言文本的不同部分的功能。

当某些文本或文本的某些部分与修辞演讲的部分功能相似时，这种对圣经文本的全面修辞类型的分析可以阐明各个部分的功能，当似乎实际上存在类比并且似乎有适合他们的工作方式。然而，第二个是修辞批评也让我们更多地关注论证和说服。这提醒我们，加拉太书主要不是神学文献或神学论文。

保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传达神学数据或神学真理，尽管它确实这样做了，尽管它是一份深刻的神学文献，但它的神学服务是说服读者采取某种行动方针。因此，修辞批评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其真实意图来看待文献，说服读者采取某种观点，说服读者采取某种行动，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视为神学真理的容器或支撑物。为一个神学体系。再说一次，虽然它们具有深刻的神学意义，但它们是服务于保罗劝说读者的牧灵意图的神学。

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新约书信的教牧意图和功能。显然，第三个价值是修辞批评关注整个文本并关注整个文本，而不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来源和形式。修辞批评帮助我们关注整个文本以及它的功能和作用。

不过，在我看来，修辞方法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危险之一是强行对文本进行建构，无论是更现代的修辞方法，还是将古代修辞演讲强加到文学文本上。我们将再次回到那个问题。

但是，例如，我的印象经常是阅读本·威瑟林顿的评论和其他修辞方法，了解该方法的所有价值和一些有用的见解，有时你会发现当你试图处理一个有问题的文本或诗句，他们经常会调查多种解释，但随后选择一种我认为支持较少的解释，但它似乎适合修辞类型，无论这是劝告、试探还是命题。根据我们对这些类别的了解，他们通常会选择最适合的解释。因此，威瑟林顿会说，保罗处理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在审议修辞或类似的东西中处理的常见问题，而对于保罗为什么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有更合适的解释。

或者这个文本意味着这个，因为这就是它在修辞性演讲、流行性演讲中所做的，而对该文本可能有更合适的解释和解释。因此，它假定一种修辞性的言语形式，然后它经常根据这种形式来解释数据，有时至少我见过的一些例子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以更好的方式更清楚地解释。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修辞批评，我再次主要讨论第二种方法，即将整个修辞言语模式应用于圣经文本的大部分内容，例如，无论是演讲还是整封书信。

对我来说，修辞言语模式似乎忽略了文本本身对文学流派的确切形式指示。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对文本的解释和文本的识别必须从文本本身的形式标准开始。我认为修辞批评的困难之一是，就劝告在哪里而言，没有正式的控制或正式的指标，我怎么知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怎么知道这是流行的，正式的指标在哪里？这里是劝告，现在我已经转向Probatio或Pararatio或narratio。

我认为，大多数判断只是来自各部分之间可能的类比和相似功能。但在我看来，似乎缺乏明确的正式指标来证明你有一个劝告，然后是一个叙述、一个命题和一个证明，等等。相反，当我特别阅读新约书信时甚至加拉太书，主要的形式指标，唯一符合语法的形式以及人们在书信中发现的不同公式，唯一的指标是保罗正在写一封第一世纪的书信，类似于第一世纪的书信或一世纪的书信。

再说一遍，我不想说保罗没有受到希腊罗马修辞言语模式的影响。我不想说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这是一个影响这一点的辩论。保罗的成长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包括希腊罗马修辞学的指导和实践？这是一个持续的争论，并影响了这一点，但是，当人们查看新约书信时，似乎发现的唯一正式线索是保罗正在写一封一世纪的书信。

这包括典型的书信开头。当我们在随后的会议中讨论体裁批评时，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但是例如，当人们看加拉太书时，人们发现的是典型的书信体惯例，这在保罗的所有书信中都是如此。他们会用一种典型的方式来打开一封书信，保罗，使徒耶稣基督给某人，问候，然后通常会转向感恩节，尽管加拉太书中缺乏这一点，有时那些从修辞角度分析它的人也缺乏这种方式。批评说，这是因为这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演讲，因为修辞惯例，缺少感恩。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除此之外，您还会发现一世纪书信的非常典型的公式。例如，当你阅读时，让我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一部分，我这样做的原因是，这是一个例子，那些根据这些内容分析文本的人我认为，对修辞技巧的理解常常是粗暴的，忽视了明确的形式指标。例如，加拉太书第4章通常被视为保罗的 **Probatio** 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只是他的证明、他的论证，但有趣的是第8节的开头。从形式上来说，当你不认识神时，你你曾是那些本质上不是神的奴隶，但现在你认识了神，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神认识了，你怎么又回到那些软

弱而悲惨的原则呢？难道你不想再次被他们奴役吗？你正在观察特殊的日子、月份、季节和年份。

我为你担心，不知怎的，我在你身上的努力都白费了。兄弟们，我恳求你们变得像我一样。你没有做错我。

大家知道，我第一次向你们传福音是因为生病。我就到此为止，但是本节的一个有趣之处是，阅读英文翻译时不一定会发现这一点，那就是它包括几个重要的公式，表明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轻微的转变，并开始一个新的单元信函的请求部分。所以这不是一个**Probatio**，一系列的证明，现在这是一个请求部分，他实际上堆积了三个左右典型的书信类型公式，你会在第一世纪的信件中找到这些公式来表明正在发生不同的事情。

这是信中的一个新部分或新焦点或类似的东西，但我的观点是简单地将第四章分析为一个论证，即修辞演讲中的一系列证明，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形式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保罗主要遵循一世纪书信的格式。再说一次，我坚信指导我们阅读的主要线索应该是正式的线索，即文本表明它正在做什么。如果修辞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那很好，但在文本上强加修辞言语模式并忽略清晰的形式特征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

第三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修辞演讲中的字母是否可以混合。即使保罗确实受过教育并且意识到这些修辞言语模式（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一些学者仍然质

疑修辞言语模式与书信和书信是否曾经混合在一起。因此，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使用修辞批评。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将整个言语模式大量应用于圣经文本，特别是新约书信。修辞批评再次有助于帮助我们掌握说服技巧，重点关注论证和保罗可能使用过的一些技巧。有时，使用整个演讲进行修辞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本的功能及其运作方式。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整个修辞演讲，并将其强加于圣经文本，并主要结合这些修辞演讲模式来分析文本。因此，这使我们结束了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釋方法和将文本作为主要意义所在的方法。文本决定意义，无论是文学方法还是叙事批评，我们所说的结构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修辞批评则不排除作者和历史背景，仍然关注文本和文本整体。。

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的困难之一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似乎仍然无法在文本中产生任何客观含义。因此，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很快就在历史和逻辑上让位于传播模型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即着眼于文本前面的意义并找到读者的意义所在，很快就变得突出。

今天，结构主义基本上已经让位于所谓的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多种方法，包括并侧重于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即读者理解文本。因此，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将转移注意力，特别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并继续讨论一些解构

主义和其他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属于专注于读者的方法。读者和意义存在于读者而不是文本或作者。